

台港及海外中文
报刊资料专辑

政治研究

台湾

第6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编 后 记

本辑收集的文章，包括对台湾国民党政权出路的分析，对台湾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发展的观测，以及对台湾土地政策的研究和地政法令资料的汇集，可作为大家了解台湾社会政治状况的参考。

台湾政治研究（6）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六号)

河北省南官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印张 179千字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3201·12 定价：1.8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目次

台湾话题

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出路

江上风 一

台北驻港大员的不寻常调动

颜知秋 五

一年来的台湾政局

邱垂亮 九

台湾的权力移转问题

南 民 一二

康宁祥的晚宴

莫灵平 一七

党外小子挑战李敖

唐明施 二一

警总文件外泄，杂志查禁新波

汤 毅 二五

执政党与党外的一场斗法

林 恒 二七

鸡兔之战：党外运动的困境和出路

汤 毅 二九

民主与文化

政治文化与民主宪政

陈阳德 三三

民权主义与现代民主发展的趋势

刘高陈 四一

土地政策

对“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之意见

四九

三民主义的土地政策和台湾的土地改革

施哲雄 五五

地政法令汇编(一、二)

八五

专 论

气象法立法要旨之分析

开 舟 九九

行政行为的系统分析

张金鉴 一〇六

评 论

评台湾当局岁首动向

凌 璆 一一一

敦促台北放弃“三不”

一一二

台灣國民黨政權的出路

江上風

進入八〇年代後，台灣的內外局勢，都呈現一個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國民黨政權所面臨的挑戰與考驗，也較之過去三十年來的任何一個時期為嚴重……

具體而言，台灣在未來的十年內，首先最須防範的是中共的孤立政策。從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終止以來，中共暫時放棄以武力攻取台灣的策略，而改由其他政治、外交、經濟等方式來孤立台灣，如果這些孤立政策都得逞的話，則下一步必然是軍事孤立，進而軍事圍堵，再進而重施以武力犯台的故技，達成其解放台灣的企圖。可慮的是，這些企圖似乎都逐漸向不利於我的形勢發展。

以言外交，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年中日斷交、斷航，一九七八年底，中美斷交、廢約、撤軍，大體上中共已完成了官式外交的孤立目的，現在與我有正式邦交者僅餘二十三國，而且其中又只有南韓、沙烏地阿拉伯和南非三國，是較為像樣的國家，其他皆為中、南美洲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國，在國際上起不了什麼大作用。其實就以上述三國中的南韓為例，老早就向中共大送秋波，若不是中共流水無情，不願因與南韓建交而妨礙了與北韓的關係，漢城與北京早已互設大使館了；沙烏地阿拉伯自法德新王就任後，其外交政策

難以估量，法德較其前任哈立德做事果決獨斷，將來若發現與中共交往，利益大於我國，必斷然棄我而不顧國際道義，據聞中共現已企圖對法德施展外交媚術，極力拉攏阿拉伯，則法德能否經得起考驗，尚有待未來事實的証明。

即使在實質關係上，中共也極力對我頻放冷箭。例如對我向外採購軍火一案，中共便極力阻撓，其不斷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要美國逐漸減少對華軍售，甚至取消台灣關係法的企圖，可說是昭然若揭。現在列根一時還不會屈服於中共的壓力之下，但下一任美國總統的動向如何，誰也測不準的。以美國人的現實，一旦發現犧牲台灣可以換取中共的支持，共同來防止蘇俄勢力的擴張時，則它對台灣的地位和存在價值，自將會重新予以評估，不管中美友誼如何地「傳統」，如何地「兩國人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該做抉擇的時候，它也一定不會猶豫的。

在經濟孤立方面，中共從中美斷交以來，即刻意的積極策動。它在東南沿海所設立的經濟特區，完全模仿台灣加工出口區的設計規模，製造的東西也和台灣類似，這些以低廉勞力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貨色不見得比我們差太多，價錢却遠較台灣為便宜，現在美國市場中，台灣的塑膠、電子、鞋類、

成衣等產品，已逐漸感受到中共廉價品傾銷的壓力，可以想見的，它在這方面的壓力將愈來愈大。

尤其最為可慮的是，由於政治安全感的不足，導致商人不願在台灣作大量長期的投資，近一、二年來，台灣的投資意願顯著下降，資金外流嚴重，聰明的商人大都不把事業重心放在台灣，而有逐漸轉移到海外的趨向，甚至把台灣當作營利的一個臨時基地，能撈多少就撈就少，撈到了就千方百計設法把錢弄到國外去置產，或擴充其海外分公司，或轉投資到其他的事業去，像這樣的經營心理，像極了一隻吸血蟲，把台灣的經濟之血拼命往外吸，等到無血可吸了，或沒機會再吸了，就一溜煙跑到國外去，這種既不願做自由鬥士，又不願當海上難民，只想到美國當寓公的投機心理，實在是今日台灣經濟上面臨的最大心理癥結。

像這種恐共的心理意識與腳踏兩條船或狡兔三窟式的投機心態，如果一直不能消除的話，要期待台灣的經濟復甦，將是十分困難的事。換言之，今天台灣經濟發展的問題，實在主要緣於政治性的因素，企業家們既對國家的遠景缺乏信心，對未來沒有期待，自然就會另作打算。現在許多大公司在海外拼命置產或投資設廠，名為實業輸出，擴大海外市場，增加僑民就業機會，實際上安的是什麼心，企業家們心裡一定有數，已有計劃的聲寶、大同、台塑、南亞、統一諸大企業，甚至包括兩大報在海外的投資，請這些大企業的老闆們摸摸良心，你們在海外的投資，究竟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一方面是有計劃的傾銷，以打擊台灣的對外貿易，一方面則由於政治外交日益孤立，影響國內的投資意願，經濟觀察家對這二、三年內台灣經濟景氣的預估，並不十分樂觀，甚至會有愈來愈壞的趨勢，則中共以經濟孤立台灣的如意算盤，豈不要逐漸得逞？

兩種可能的軍事冒險

如果台灣外交僵局打不開，經濟又日見衰退，則下一步可能就要誘使中共軍事冒險了。中共採取軍事冒險的方式很多，其中最有可能的有兩種方式

一是軍事封鎖，即不以武力進行進犯，但實施海上的封鎖政策，例如在金馬前線四周佈雷，派出大批船艦包圍這兩個孤島，另外並在台灣海峽的重要航道上，採取管制措施，限制各類船隻的通行，特別可能在基、高南北兩大港的外海實施封鎖，不准各國船隻進出港口，引起各國恐慌，台灣的對外貿易必大受影響，連帶也必然使島內的民心士氣大為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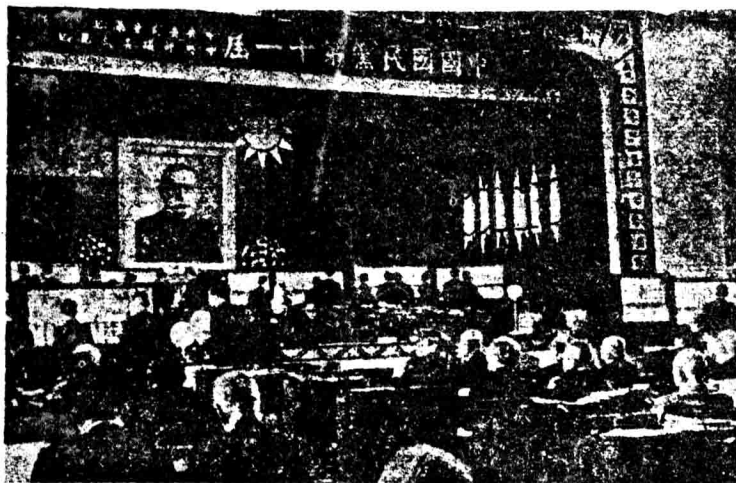
二是軍事騷擾，上述的封鎖政策必須動員大批的船艦，就純軍事觀點，所費成本較高，也可能遭到台灣的反擊或反包圍的策略，則中共可能採取騷擾式的軍事冒險，即以少量的飛機或船艦，對某特定的目標加以攻擊，在完成有限的戰略目的後，即立即撤退，以造成台灣的困擾。例如中共突擊金馬前線的運輸補給艦，或偷襲在台灣海峽上航行的船隻等，都可達成騷擾的目的，同樣會引起台灣的恐慌。

台灣如果一切反應都按照中共的預測如期發生，則再下一步就必然是大舉犯台。在外交上既已達成孤立台灣的目的，世界各主要國家都承認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則其攻擊台灣，應只是內政問題，是中共的家務事，他國不得干涉，中共就可肆意而為。如果那時台灣的民心士氣又動搖，士無鬥志，不能引起同仇敵愾心理的話，中共的陰謀就必然會得逞，那就是一千八百萬同胞生靈塗炭的時候了。

因此，打破中共對台灣外交、經濟、軍事的孤立，應是突創新局的第一步，而其關鍵就在心防的能否鞏固。

主帥要有必死決心

台灣心防的鞏固與否，領導階層的心態是最重要因素，主帥若有必死決心，士必有效死的心理準備。抗戰時，由於領導階層的堅定意志，終使全民敵愾同仇，奮戰到底，而終贏得最後的勝利。然而今日的領導階層是否有這樣的守土決心呢？上述一些投機的商人中，實則還有不少是達官貴人，甚至



台灣的領導階層應有守土的決心

是國民黨的中常委者，他們的心態尚且如此，則如何要一般老百姓誓死保衛鄉土呢？從前剛撤退來台灣時的口號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現在若干意志不堅，信心動搖的失敗主義者存的反而是「離此一步，海闊天空」心理，早已安排好了退路。

在政府高級官員中，有多少已取得美國的永久居留權者，每年都要回去一趟「護卡」，政府當局應澈底清查，他們無論用什麼理由解釋，這種綠卡心態就要不得，一般小市民尚情有可原，身為政府機構的公務人員，還申請綠卡，其對國家的忠誠性就很值得懷疑。至於擁有美國籍，大唱「天佑美國」的雙重國籍者，就更等而下之了，不驅逐出境算是客氣了，怎可再引進担任大官？目前這類官員以在學術界、教育界和新聞界為最多，政府實有責任加以整頓一番，不能再推拖敷衍下去，否則腐蝕民心士氣，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忠奸不辨，如何能領導社會？又如何能令大眾心服？

政府有些官員動輒拿海外的猶太人相比，但是否也有人把我們的政府大員拿來和以色列的大員相比？他們的政要中有人拿美國的綠卡嗎？有人做狡兔三窟的準備嗎？有人曾細心去安排退路嗎？前總理拉賓，因為他的太太違反國內法令，在美國銀行開一個戶頭，存一點小錢，事發後拉賓就引咎辭職，這與我們這裡有些人巴不得趕快把所有資產移轉到國外的心理相較，是否有天壤之別？

如果心防鞏固了，則下一步要努力促使全民有同仇敵愾的心理，這個工程更為艱辛浩大。

前面說過，中共處心積慮要謀我台灣，這和台灣是否宣佈獨立無關。有人天真地以為，台灣宣佈獨立，中共才會有武力攻打台灣的藉口，不獨立，中共就師出無名，我們就可偏安一時，這種想法是過於天真的了。不論獨立與否，只要中華民國政府存在一天，中共就一天不得安心，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就有可能被取代的機會，無論如何，中共都不願留下禍根。明成祖從北平南下「靖難」，南京城破時，惠帝失踪，有人說他死了，找不到他的屍首，成祖就大為緊張，唯恐惠帝將來突然出現復辟，他的正統地位就要動搖了，因此下令全國大肆搜索，後來謠傳惠帝已易容出城，逃到南洋去了，於是成祖立即下令鄭和督造大船，南下到南洋羣島，名為宣揚國威，協和萬邦，實則主要目的還是打聽找尋惠帝的下落，以防惠帝的復辟。

今日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對中共言，猶如惠帝之於明成祖，只知惠帝是失踪，不知蹤影，而台灣却是活生生的在海峽對岸存了卅三年，這對中共政權實有如在背之感，其必欲去之而後快，乃無可懷疑之事。因此，不管你是獨立也罷，維持中華民國現狀也罷，只要有機可乘，它都會下手的，台灣宣佈獨立只是更加刺激它懊惱的情緒而已，與犯不犯台並無絕對的關連。

實言之，如果台灣有實力足以自保，國際局勢發展又對我有利，則即使不聲不響，中共對台灣也無可奈何。反之，即使台灣不獨立，只要時機成熟，中共也會動手的。

中共要想進犯台灣，必先考慮它的成本與代價，而事實上，多年來中共就一直存著「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不戰而能逼使台灣投降，是它的上上之策，否則退而求其次，先運用和談攻勢，與台灣和平共存，再伺機瓦解台灣的反共意志，不聲不響的達成解放的目的。如果上兩項智取的方案都行不通，則只好力敵。但使用武力時，中共也必先考慮它可能付出的代價，如果中共傾全力進犯台灣，却遭到一千八百萬同胞的誓死反抗，就算最後目的得逞了，中共也必然傷痕纍纍，損兵折將，元氣大傷，台灣戰鬥至最後一兵一卒，變成一片廢墟，中共得之又有何益？

在這種情況下，武力犯台的行動中共就得考慮。正如一個大人與小孩子打架，小孩縱使敵不過大人，但鬥志高昂，拼死不退，戰到最後，大人固然勝利了，却也斷了一條腳、一隻胳膊，滿面傷痕，變成終生殘廢，則這個仗能打嗎？

因此，執政當局應充分掌握這個矛盾，利用中共的心理弱點和國際微妙的關係，先在夾縫中求生存，上下一心，團結自救，再伺機找尋出路。兵法所說的「不恃敵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才能成立的。

考慮發展核子武器

台灣要進一步建立鞏固的心防，則應考慮發展戰術性核子武器，這也是對中共武力犯台的一大嚇阻力量，這種看法，在今年五月間張旭成返國時，於台大政治學會的演講會上，也做過相同的建議，他的主張在國內曾引起不同的反應，其實這個爭論並不自今日開始，早在七、八年前，國際間盛傳台灣有製造核子武器能力時，即已廣受社會各界注目。反對台灣製造核子武器的最大理由不外：

一、耗費過大，如政府傾全國力量移往核子武器的發展，將影響經濟的成長率，台灣同胞的生活水準將下降。

二、原料取得困難，實際發展將受到限制，即使完成數枚戰術性原子彈，也無法再造出第二波的核子攻擊能力。

三、怕刺激中共，增加台海緊張形勢。甚至遭到中共的核子報復。

四、美國並不贊成台灣製造核子武器，不僅限制原料的供給，實際上也曾多次阻擾台灣發展和製造原子彈。

這些理由，說服力實在不夠。現在台灣發展核

子武器，純粹是從政治、心理、戰略上來考慮，有了核子武器，雖然規模、威力都不能和美、蘇、中共等相比，但有安定民心的作用，恐共的心理會稍為減輕。對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和對海外的華人心理，尤其具有極大的政治號召作用。我們看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下旬初在羅布泊舉行核爆時，學世多麼震撼？不但列強刮目相看，對海外的華人心理，尤其是一大刺激，更加速了對中共政權的「認同」、「回歸」，中共的國際地位也在一夜之間暴漲。

列強本來就不安好心，在自己擁有數量龐大的核子武器時，就提議其他國家簽訂核子擴散條約，要求他國不要發展非和平用途的核子能，這是極不公平的。弱國，尤其像我們這樣處境的國家，是沒有理由接受這些無理要求的，這點中共看穿了，我們為何還看不透？而核子武器的發展，現在大家都知道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二次大戰以來，還沒有爆發過核子戰爭，儘管世界烽火遍地，核子武器却多是備而不用，可說完全是用來平衡國際政治，作為外交談判，甚至是政治要脅的一大籌碼。則台灣即使擁有原子彈，其作用也僅止用於與中共討價還價，並嚇阻其武力犯台的動機而已，怎會真正派上戰場呢？

因此，政府數次申明，不發展核武器純是為了避免我國窮兵黷武的印象，並不希望以之來殺害自己的同胞，這真是自欺欺人的大笑話，不是鄉，就是太不了解現代核武器的戰略價值了。台灣將來要防止中共犯台，唯有以高昂的士氣和精密的武器來與之相互對抗，則與其用傳統武器，何不用核子武器來替代呢？不是更具有嚇阻效果嗎？當然此事攸關國防大計，政府也許另有顧慮，或者只能做不能說也說不定，我們希望上述這些擔憂都是多餘的，更望政府英明睿智，早就胸有成竹。

至於發展核武器需要大量經費，恐將影響經濟成長一節，坦白而論，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大家要有心理準備，我們寧可降低生活水準，也要製造出來原子彈，以現在台灣的經濟生活水準，實已不比先進國家差，在物質享受上略為緊縮一點，又有什麼關係？我們生活再緊縮，也不致於陷入像中共那樣「寧要原子，不要褲子」的窘境。台灣生活水準再提高，若只是軍事弱國，別人也瞧不起，人民沈迷於物質的享受，這個太平日子也不會持續太久。

建立在開明進步之上

其次，談到要使一千八百萬同胞人人都有必死決心以保衛鄉土，就需要內部先造成一股同仇敵愾的民氣，這股民氣的社會基礎，就必須建立在政治上的開明進步之上。現在許多人喊團結自強，立意不錯，用心良苦，但却沒抓到問題的關鍵所在，那就是更民主，更法治，才能促進和諧團結，自立自強才有價值，這一點，執政當局應該看清楚才好。現在台灣民主的最大障礙在戒嚴與黨禁兩件事

。戒嚴一般認為不影響日常生活，對大眾的福祉沒妨礙，這是欺人之談，其實當局心裡也明白，戒嚴當不是為了防範一般升斗小民，而是為了防範對政府有歧見的不滿份子。明白一點說，藉著戒嚴令的頒佈，就有權得禁止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的自由，特別是停止結社權，這是黨禁的最有力藉口，也為執政黨的不開放組黨政策，找到合法的法令依據。現在政府當局對反對派人士的集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妨害社會秩序，不會突然去取締，但若真有組織黨企圖，就不那麼客氣了，以前的雷震案、不久前的余登發案，情況都如出一轍，「美麗島事件」則完全是黨外人士自己不謹慎，說是咎由自取，並不太過份。

在台灣搞民主運動，如果不小心，會被視為是革命運動，最後搞到自己究竟是怎麼被捕的，都莫名其妙。但這種時代就要過去了，黨外人士不會優到再重蹈歷史的覆轍，今後黨內外的鬥爭，將由過去的激烈火爆，轉為溫和沈潛，表面看不出什麼動靜，骨子裡不論是鬥爭的手腕或鬥爭的層次，都會逐漸升高，加上一般民智已大開，執政當局要適應

這項新變化，只有坦白拿出決心與誠意來，以更民主開明來順應時代的潮流，滿足羣衆的需要，則黨禁的開放，戒嚴的解除，應是今後執政黨努力的目标。

黨禁三十多年來一直不開放，主要有一項錯誤假設，即：黨外將因正式組黨而逐漸壯大，進而取代執政黨，在中國歷史上就叫改朝換代。其實細分析，這個假設是多麼一廂情願，國民黨對自己簡直沒一點信心。以現在黨外勢力的分佈言，權力多元，政出多門，甚至各搞出頭，自立門戶者已是公開的秘密，將來一旦正式開放黨禁，黨外內閣必然就會公開化。激進的不容於溫和的，左派不容於右派，南部黨外不服北部黨外，地方不受中央節制；

各種開發中國家多黨林立可能產生的弊病，都有可能在台灣出現，黨外尤然，則執政黨何懼失掉政權之有？就算失掉政權，由另一派起而執政，國民黨維護民主憲政，堅守民主陣容的坦蕩胸襟，也必將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可貴的一頁。促進台灣政治走向制度化、民主化，是目前執政黨對整個中國所能作的最大貢獻，其他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的大幅提高，實是餘事耳，不值大肆炫耀。不過這個假設是不太可能實現的，今後執政黨若愈民主開放，這個政權愈保得住，愈會成為全民的政黨，若是愈緊縮保守，前途也就不敢想像，正是你愈怕的，它愈會來，愈不怕的，它愈不會來。

將來執政黨一旦創造出一個全民的政黨，這個政黨也就成為全民的政府，黨外就沒什麼發展前途了。要言之，今日台灣黨外勢力的消長，完全是奇託在國民黨革新的成敗之上，像一場棒球賽一樣，它要藉執政黨的失誤與暴傳，才有盜壘或奔回本壘得分的希望，否則國民黨如確實與民衆在一起，黨外就一點沒指望了。

台灣是世界軍人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每年國防預算一直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原載：南北極(港)一九八四年二六六期九〇—九四頁)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

台北駐港大員的不尋常調動

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名大員奉調常駐香港；警總駐香港的調查處最近擴大編制；一向呻吟的「海外工作會」最近撥巨款在香港辦刊物及籠絡被國民黨認為「持平」的香港知名人士；港府高層華人大官的親人獲情報局巨款在港、台兩地「投資」；……這一切都發生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究竟意味着什麼？

月前我途經香港，在一位朋友的住所偶遇一位大陸官方機構駐港人員，詢以對香港「短線前景」的看法，這位先生輕鬆自在的地說：「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局勢大定，今後必定向安定繁榮之途發展，不會再有其他變化，香港的穩定已經獲得保障，繼續繁榮則仍待大家努力。」

這話很中聽，也反映了絕大多數香港人的願望。但是事物的發展是否真如這位先生所說的那麼輕鬆而一帆風順呢？從我在台灣的所見所聞來看，事情似乎並非如此簡單。這位先生所說的話，如果只是為了向我這個「台灣客」做宣傳工作，倒也罷了；但如果他所說的是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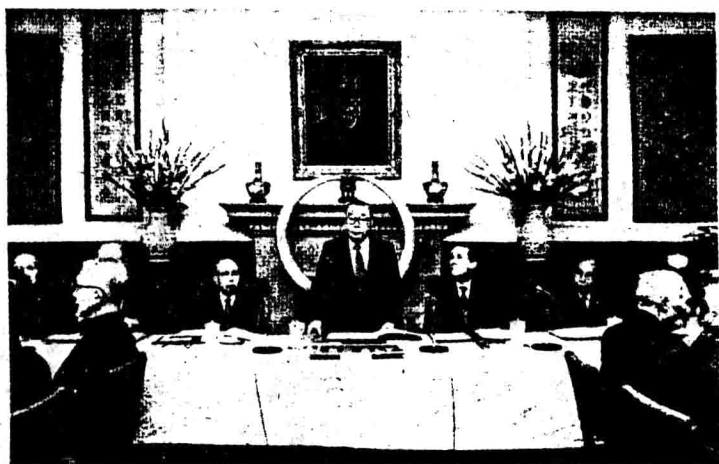
表大陸官方的肺腑之言，則未免失諸輕率了。香港在過渡期——也就是台灣黨部人士所謂的「香港短線前景」——內的局勢，需要一分为二來看。在總的發展方向上，這位先生的話是有遠見的，但是在朝着這個總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可能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和前所未有的干擾和阻撓，這些干擾的一個主要方面來自台灣。台灣國民黨統治階層為了本身利益，或甚至可以說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維繫和製造台灣人民的反共懼共心態，因此就必須不遺餘力干擾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以便向台灣人民「證明」與大陸統一的「害處」。

這篇通訊是我以並不輕鬆和並不輕率的態

度，引述我從台灣圈內人士中獲得的一些內幕資料，供《鏡報》讀者更清楚認識香港短線前景作參考。

中央黨部大員調駐香港

六十年代後期，國民黨停止在大陸進行暴力破壞活動以來，香港作為「反共橋頭堡」的作用就大為改變。在此之前，派駐香港的國民黨特工人員都是精煉幹才，需要有實幹的意識與才能。而在被迫停止暴力破壞活動後，這批人馬陸續被調回台灣，留在香港的國民黨忠貞之士所做的只限於所謂「文宣」工作，這種工作是誰都會做的，不需要有什麼才幹。這些年



蔣經國在「總統府」會議室主持「國家」安全會議。

來，各情治單位人員視調駐香港為養尊處優、論功行賞的優差，尤其是一九八三年九月港幣對美元大幅貶值後，各單位駐港人員皆以美元支薪，待遇比在台灣高數倍。在台灣情治人員都鑽門路設法調駐香港，而已經駐在香港的人員，則千方百計阻撓台灣「來人」，大家忙於你爭我奪，反而把駐在香港的「使命」忘記了。

一個現成實例，足以說明這批駐港忠貞人士之衆生相：江南事件發生後，駐港「文宣人員」認為補救行動（粵語稱「補鑲」）是駐美

「文宣人員」的責任，港方按兵不動。直至台北中央黨部下令申斥，才在香港成立專職處理江南案「善後事宜」的文宣小組，而這個小組的能力極有限，僅止於請客吃飯及派發紅包，拉攏一份所謂「知識分子報紙」的幾名副刊作者，以大合唱姿態說江南「可能」是被中共特務暗殺後「嫁禍」國民黨。當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承認涉及此案後，大合唱又變調為「江南不值得同情」。這個文宣小組之「才幹」由此可見。連江南七封情報信之發佈，也是由台北中央黨部親力親為，如果要靠這批庸才來執行這項使命，恐怕只能出現在《香港時報》上。

我之所以要加插這段題外話，是爲了說明台北情治單位在香港沒有人才，而沒有人才，正就是因為這些年來台北中央黨部並不重視香港這個橋頭堡。

可就是就在中英協議簽署後，大陸駐港機構的部份人員認為香港安定已不再成為問題之際，台灣最高當局突然採取一項不尋常並且極耐人尋味的人事調動，決定派遣中央黨部海外工作會（簡稱海工會）總幹事黃達紀常駐香港。

海工會總幹事是在台灣以外，從事情治活動的指揮者之一，以前從未有過如此高級的情治人員常駐香港。

黃達紀又名黃得基、王大傑、黃天佑、王大吉、黃裔，是蔣經國的第二代嫡系幹部。台灣圈內人士把蔣經國嫡系幹部分爲三代，賴南時期培訓的是第一代，抗戰勝利至退出大陸的五年期間，在蔣經國直接領導下的三青團和勘建大隊的骨幹是第二代，到台灣後救國團主持的，歷期陽明山訓練班出身者是第三代。到蔣

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他已經總攬黨政軍人事大權，非但不再培訓嫡系人馬，而且努力使各派系融匯一體，至今仍在談論「太子系」或以「太子系」自居的人，都是落後於台北的現實將近一個世代了。例如當今在蔣經國面前講話最有份量的兩個人——黃少谷和馬樹禮，年齡都比蔣經國大得多，而且從來不是「太子系」的人。

以國民黨官場的標準來衡量，黃達紀是一個廉潔奉公、腳踏實地的人。黃在許多方面，足堪與北京報紙上表揚過的鄙視特權的老幹部媲美。他在台北的住所與海工會一般科員無異，筆者蝸居恰與黃先生寓所相距不遠，幾乎每天清晨都看到黃夫人挽着菜籃上街買菜。這樣的方面大員，在台灣恐怕是找不到第二個的。

黃達紀不僅是廉潔奉公、作風正派的賢官，而且是在海外工作（這是近年來國民黨在外交逆境中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一再受到褒揚的能官。蔣彥士和馬樹禮先後兩位台北中央黨部秘書長皆視他爲良臣。這樣一位被國民黨最高階層視爲模範，並倚若股肱的重要幹部，現在被內定接替行將退休的《香港時報》社長陳寶森常駐香港。他當然不是要來香港養尊處優的，他的資歷也決不會只是擔任一家報社的社長那麼簡單。人們難道會相信國民黨當局的這項人事調動，是爲了協助促進香港的繁榮安定？

旅行社裏的少將處長

台北警備總司令部（以下簡稱警總）駐港調查處處長，多年一直是以國華旅行社經理名

義常駐香港的王重山先生。王先生的出身是重慶時期的中央大學政治系畢業生，也屬將經國的第二代幹部。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以及有些人認為香港繁榮穩定從此可以一帆風順之後，王重山在台北「警總」禮堂舉行的一項公開儀式中，獲得晉升而授予少將軍銜。

不知內情之人，也許認為這只是論資歷的循例晉級。但圈內人士看法不同，過去許多年來，各情治單位駐港首要人員，都是校級軍官或處級官員，受台灣有關單位直線領導，彼此在港只有橫的聯繫而沒有從屬關係。現在其他情治單位如安全局、情報局、調查局等的駐港首腦仍是校級軍官，而「警總」駐港的王重山晉升將級，是爲了配合形勢需要，把過去分散的力量集中統一指揮，以備在必要時重拳出擊。「警總」與情報局在港主要任務，一向是與黑社會進行聯繫，他們總不會向黑社會重拳出擊吧？他們也未必有足夠的能量向大陸的共產黨出擊，而是爲了要使台灣老百姓相信統一有弊無利，所以他們必然是以香港的繁榮穩定作爲部署干擾的目標。

每本一千元的奇異月刊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在香港出現了一份由前駐香港處處長俞利羣主持的月刊，這份刊物據說每期印量「近萬」，但實銷不滿三百本。現在究竟已出到第七還是第八期，人們也不清楚。

這份刊物的誕生，也充份說明了台灣對「九七問題」的態度。

九七問題是屬於和黃澄記完全不同類型的海

工會幹事，駐港已經二十多年，在漫長的養尊處優期間，很想有所作爲。七十年代初期，大陸仍處在文革的動亂中，香港出現了兩份頗受知識份子重視的以政治爲主的綜合性刊物，這兩份刊物在當時被大家認爲是「左傾」的（用現下香港的流行語是親中刊物），它們在香港和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當時俞利羣閒得發慌，一再向台北海工會申請撥款要求辦一份刊物來抵消這兩份刊物的影響力。海工會向秘書長要求撥款，都因經費不足而未獲批准。而現在，那兩份刊物已由「親中」變成「反中」，其中一份且與台灣情治單位搭了線（還沒有到「掛鈎」程度），這時台北中央黨部却突然撥出巨款給海工會香港處辦刊物。顯而易見，它的獵取目標不再是那兩份刊物，而是極力鼓吹香港「無法安定」、「無法繁榮」一論了。

據親眼看到報銷單的圈內人士傳出，這份刊物創刊初期的每月經費將近四萬美元，約合港幣三十萬元。包括高級商業大廈的寫字樓租金、對個別撰稿人的優厚稿酬、編輯人員的薪金（也以美金計算）、以及刊物應有的各項開支，而佔最大宗的則是俞利羣的實際應酬費——他們的術語叫聯絡費——其中包括一些大百貨公司的購物賬單。圈內人士打趣說，這是全世界最名貴的刊物，以開支與每期實銷量計算，平均每本約合港幣一千元，而售價僅爲港幣五元。

台北中央黨部不是不知道這種情形，但認爲物有所值。並不是這份刊物產生了什麼影響力，而是通過這份刊物使海工會香港處得以與

一些被國民黨視爲香港「持平」人士的人建立了友誼。例如一位在宗教界、工業界、社工委頗負盛名的青年才俊，可能在不知道這份刊物的背景下，欣然應邀成爲其每期特約撰稿人。國民黨在七十年代沒有經費辦這種刊物，而在中英協議產生後突然拋出這份千金寶刊，其目的不言而喻了。

港人治港與「外婆」治港

在台北官場，經辦人員中飽私囊堪稱見怪不怪，可能早已列入雜項開支中，幾十萬元一個月辦本雜誌對於這個「大有爲政府」說來實在微不足道，真正的大手筆還在後面哩。

先讓筆者講一則故事。

故事要從一九八一年冬季說起。那時，「九七問題」剛開始成爲北京和倫敦之間認真對待的「問題」，台北官場中一些較有遠見之士，已經看到香港問題對台灣日後處境可能產生的重大衝擊。其中一位深爲筆者欽佩的有識之士，是當時擔任行政院新聞局長而現任台北中央黨部文工會主任的宋楚瑜先生，他在一次黨內會議中說：「如果共黨收回香港，他們一定會竭盡全力把香港治好，來迷惑我國（指台灣）的無知百姓。從現在起我們就要詳細研究假如共黨收回香港主權後的應對之策。在名義上，我們的正式機構當然不能留在匪區香港，就算他們爲了統戰目的挽留我們，我們也不能留，以免中計。但實際上，我們從政治、經濟和基本國策上考慮，都不能完全放棄這個地盤。我們一方面要留下我們的地下人員，另一方面要利用這幾年的時間盡量在香港本地勢力中爭



自左至右為蔣孝武、周應龍、宋楚瑜。

取朋友，即使是反對我們的人，只要他也反共，就是我們爭取的目標，特別是在香港政府中的華人官員，受英國人重用而又可能被敵人（指共黨）所容忍的人，我們必須及早下功夫」（大意）。

宋楚瑜並不是情治單位的核心人物，他在講這席話時，情治單位事實上已經在這樣做了，宋不過是在無意間洩漏天機而已。

「天機」之一是香港政府一位中上層的女性華人官員，在一九八一年冬經由海工會的安排到台灣訪問了五天，由於這位官員的職務與新聞工作有關，由當時的新聞局長宋先生親自

接待。她在香港的一位友人與俞利羣稔熟，曾打趣向俞利羣說：「你真有辦法，把這位盛傳即將升官的明日之星弄回國去了。」平時慣於自我表彰功績的俞利羣這次却鄭重地說：「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她是去探望外婆的。」

這就出奇了。三十多歲的女人從來沒有去過台灣，怎麼忽然在台灣有了一個外婆？

此後這位女官每逢放年假或有 Long Week-end，就到台灣去探望「外婆」，據說「外婆」非常寵愛她，所以要她一有空就去台灣，多麼富有人情味！

這位女性官員後來果真升任獨當一面的官職，每逢外出公幹，必然順道訪問「外婆」。在一九八一年之前從未提到過的外婆，忽然發展到每年至少要探望三次的深厚感情，真是難能可貴呀。

近來有一種說法，英國人將加速實現香港政制本地化，大概到一九九〇年就會出現「港人治港」的局面，這些治港的港人當然是指英國人所培育的本地化官員。筆者有點擔心，這樣的港人治港，是否會變成「外婆治港」？「外婆治港」是很符合宋楚瑜先生的講話精神的。

對未來「港督」的巨額投資

真正的大手筆，是對一位更高級的港府華人官員的巨額投資。

「外婆」大概是愛外孫女心切，透過外孫女邀請她的頂頭上司去「外婆」家好好款待幾天，一方面酬謝提拔外孫女之恩，同時也可以談談心。

但是這位正在宦途中「春風得意馬蹄疾」的上司，鑒於眾目睽睽之下不便赴台灣，婉辭謝絕了。可是「外婆」神通廣大，經過調查研究，很快就知道這位上司有一位嫡親弟弟，過去也是港府高官，廉政公署剛成立時提前退休了，到台灣投資開設了一家小型紡織廠。「外婆」愛屋及烏，伸出援手，在新竹附近送出一幅大面積的廠地，不滿一年時間內，小廠變成大廠，並且一變成爲台北股票市場上的上市公司。

這也許可以說是扶植備資，但再看又不像，因為「外婆」還拿出逾千萬元港幣供這位外孫女的上司的弟弟在香港仔買廠地發展工廠。

不幸「外婆」可能有點老邁昏庸了，竟然沒有好好約束她老人家在香港的一些子弟，這些子弟都是什麼局、什麼處駐港人員，爲了爭功邀寵，在他們爭相插手控制的一份銷路頗大的報紙上，不擇手段吹捧這位外孫女的上司，竟然以頭條新聞「報導」這位上司將會成爲英國治港後期的華人「港督」。這下子可把上司嚇壞了，「外婆」也爲之勃然震怒，有份參加控制這家經常大言炎炎報紙的一名安全局駐港主任因此丟了紗帽，回「外婆」家坐冷板凳去了。

※ ※ ※

故事還有很多，而且很長，不想贅述了。筆者只想提醒我的香港朋友們，當你們興緻勃勃迎接未來的繁榮安定的歲月時，不要忘記有些人看不順眼，而且隨時會伸出橫手。願君保重。

※

一年來的台灣政局

□邱垂亮

●在內是保守勢力有增無已，收緊專制統治，對黨外加強壓制；對外是全面撤退，劃地自限，作繭自縛。整體來看，這一年台灣的政治發展，無論內政外交，都呈現倒退。

今年六月間，因為母親的重病和去世，我回去台灣一趟。那時，正值蔣經國第二任總統和俞國華新內閣開始不久，海內外不少人會寄予希望，希望國府當局出現新人新政，在內部政治民主革新，對外國國際政治多元開放參與，和海峽兩岸國共長期對峙鬥爭死結的應對與紓解上，都有突破創新的作為。可惜，我看到的、聽到的是一片凝重沉悶、遲疑不定、保守壓抑的跡象和風聲，一切都好像在嚴厲緊縮之中。

我深深感覺不安和失望，回澳洲後，寫了幾篇有關台灣政局發展的文章。幾位朋友看到這些文章後，向我反映，不少人覺得我最近對台灣國府態度轉硬，文章轉尖銳刻薄；一位好友甚至說我批評國民黨批得太「濫情」，有不少偏頗之處。他好意地說，這樣做不只是會犯錯誤，而且會失去諫政的效率。我知道我是有點「濫情」，當初我的解釋有兩點：一是希望下「猛藥」而使國民黨避免固步自封、倒退保守化；二是半年前，我真的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國府的保守勢力正在準備觸發「文字美麗島」、要一網打盡「美麗島」事件後殘餘的黨外勢力，所以我用強硬的語句，提出警惕，希望避免「文字美麗島」的發生。

現在，一九八四年就要過去了。一年來，世事

多變，國民黨是不是真的在「處變不驚」中有效地推展政治運作，實施有效的政策來對付內外四起的新舊政治問題，為台灣和中國的政治前途指出和走出一條理性法治、自由民主的道路來呢？還是，如我最近的批評，國民黨一年來的政治作為實在乏善可陳，在民主現代化上大開倒車，在世界政治舞台和與中共的政治鬥爭上一再固步自封、處變不變、舉棋不定，毫無衝破困局的決心、能力和創為？

保守勢力抬頭

在台灣內部民主政治發展方面，從去年年底立委補選黨外失敗，到蔣經國當選第二任總統和俞國華內閣組成，這段時間中，黨外自我檢討和重整的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派系路線之爭，仍混亂成一片，烽火綿綿。國民黨也就樂得隔岸觀火。而在蔣經國本人健康缺佳、行政院長孫運璿突然腦溢血的龍首無主的政治領導層的真空狀態下，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開始趁機抬頭擴張，對去年六月間情治頭子王昇下台後一度情勢看好的黨內自由派，開始多方施加壓力。

人事上，副總統由缺乏深厚本土草根性、又較缺乏魄力和野心的李登輝出任，而不是由對國民黨的保守傳統較有威脅性的本土實力人物如林洋港者



▲蔣經國連任是個保守的安排。

接任。行政院長，則由缺乏政治能力、經濟政策保守、社會意識低落的蔣家臣俞國華擔任，較有革新思想的人物蔣彥士，只退守本位，謹言慎行地站在政治舞台的邊緣上。更有甚者，保守落後過氣的政治人物，如沈昌煥、汪道淵、曹聖芬、趙自齊、何宜武之流，竟「東山再起」，違反時代潮流地重入（或進入）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權力中心。沈昌煥變成總統府秘書長；汪道淵出長「勘亂時期」的太上內閣國家安全會議；而曹、趙、何等則進入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和八九十歲的黃少谷、袁守謙、高魁元等「元老」緊接在一起，他們在黨內的保守實力可就有增無減，頑固威勢有長無消，使幾個新加入的輕量級的中常委如高育仁、張建邦、許水德等，顯得更加蒼白無力。

五月，蔣經國二度出任總統，對黨外的政治犯沒有宣佈特赦，並指派「帳房先生」俞國華組閣。排出的內閣陣容，除了因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而下台的自由派李煥復出，還引起大家的興趣外，本省籍的年輕才俊吳伯雄出長內政部和施啟揚出長法務部雖是創舉，但其「以台治台」，用這兩位年少老成聽話的台灣人來對付黨外、台獨、政治犯和其



▲黨外大搞「國民黨學」，遭到壓制。

他離異分子的用心，則是很明顯的。而林洋港的「賜上樓梯」、趙耀東的「三振出局」、徐立德的「揚威耀武」（已有謠傳是下任閣揆人才），以及其對有才幸、敢講話、願作為的人士的不敢和不願使用，而對「凡是」(Yes man)派人物的增加（甚至是大量）使用的保守作風，則更是一目了然。

接着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和省市黨部各部會主管換人，宋時選、關中、鄭心雄、馬英九等蔣府「家臣」的掌握實際政權，雖然都會是年輕才俊，但是和俞國華遙遙相應，都是「家天下」傳統政治文化的產物。

當然，談政治，論人也要論事，實事求是。蔣經國自己身有重病，仍要非我莫屬地二度出任總統職位，已是一個缺乏前瞻性的保守決策。俞國華等「家臣」的大量使用，也是另一個沒有開創性的保守扶擇。接着，半年來的表現，在重要政策層次上，也就處處顯示了這個最高領導層守成保養的基

本老朽心態。

對內壓制的加強

細算這一段時間蔣經國政權的政治業績，實在找不出幾項值得大書特書的大有為的政策，尤其是促進台灣自由民主現代化的革新政策，更是少之又少。經過長期海內外不停的呼籲和壓力，就在「文字美麗島」風聲鶴唳的日子中，國府突然在「蔣經國的痛苦」的領袖意志下，以減輕假釋方式釋放了林義雄和涉及施明德逃亡案的長老會高俊明、林文珍等人。這個幾度難產、拖了又拖的釋放決定，還是引起了海內外各方人士的讚賞。無疑，這是國民黨一年來最值得肯定的政治作為。

但是，不久，法務部長施啟揚就在立法院大言不慚地宣佈：台灣根本沒有政治犯，只有經過法院合法審判的刑事犯，所以台灣沒有像南韓、菲律賓等國釋放政治犯的必要。加上其他種種跡象，一般看法認為「美麗島」的其他主犯，姚嘉文、張俊宏、黃信介、呂秀蓮等，都可能要服完長期徒刑，才有再見自由天地之日。十一月初，國府當局更以不服感訓為由，將「美麗島」軍法大審受難人之一的林弘宣，由新店安坑的明德監獄移往和家人見面困難的人間地獄綠島。這件不人道的政治決定，引起了廣泛的關懷和抗議，也再一次具體顯示了國府政權的反民主、反現代化的一面。

在基本人權的言論自由方面，雖然黨外雜誌一年來如雨後春筍，國民黨一再查禁，也一再讓它們「雙百」式地出現，其實只是國民黨一項策略性的政策運用。一是讓黨外路線和領導權之爭的亂局擴大和惡化，國民黨好收漁翁之利；二是不以不停的查禁來打擊黨外發行雜誌的經濟基礎。在六、七、八

月間，因為黨外雜誌大搞「國民黨學」，揭發蔣家和黨內過去和現在的陰暗一面，警總一共把《前進世界》、《自由時代》、《民主時代》、《台灣廣場》、《八十年代》、《新潮流》、《政治家》、《先鋒時代》、《蓬萊島》等九本雜誌停刊一年，同時查禁、查扣了四十多期的黨外刊物。半年來，國民黨還發動全面性的大眾廣播媒介來圍剿攻擊黨外雜誌。

就在這樣「捉巫婆」(witch-hunting)的政治氣氛中，十一月底，剛上任不久的新聞局長張京育，還自我矛盾地宣稱：「就法律觀點而言，刑法二十七章妨害名譽及信用罪中，就有對公然侮辱、誹謗罪等處罰規定，一般國民和國家元首都受到同等的保障，出版物如觸犯這些規定，將可依法予以處分。」他又說：最近有政論雜誌，言論與以往有很大的差別，「過去許多雜誌走法律邊緣路線，至少還在法律規範之內，而現在則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對政府首長肆意攻擊，極盡挑撥分化，甚至誹謗先總統蔣公及其家屬，並將政府在復興基地建設的成果，批評得體無完膚。」

其實，關於法律規範之內外、誹謗罪之成立與否，須經法律程序，由法院審判才能確定，平民與元首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哪裏有由幾個情治人員的自我心證就隨便決定什麼是誹謗、什麼是觸犯法律的法理和道理？更哪裏有情治單位自己秘密心證決定後就自己劍及履及執行起停刊、查禁、查扣的法理和法制？這種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權於一身的封建政治行為，哪裏有人權、法治、民主、自由的影子？而真正的問題是出在那人類近代史上最長、最莫名其妙、最不合理理的戒嚴法。國民黨一再苦口婆心地強調只實施百分之三的戒嚴法，卻有黨

禁、報禁、查禁刊物、審判雷震以來的政治犯、限制其他基本人權的連串紀錄。

所以，當十一月二十一日國府內政部長吳伯雄在立法院公然宣佈，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討會之類的組織，均是非法組織，不自行解散、停止活動，有關單位將依法取締時，明顯地，每個人都感覺到台灣的政治氣氛在嚴厲緊縮了，國民黨又要使用那百分之三的戒嚴法大展神威、整肅異己了。

多年來，黨外不能辦報，不能組黨，不能遊行示威。一些非黨團性的串連結社性的社團和活動，如「美麗島」的服務處、許信良的慶生會、選舉時的後援會、雜誌的編輯和作家聯誼會等，只是在不斷爭取下，才被勉強忍受。這些集會和結社之所以「不合法」是因為在戒嚴期間，人民的集會和結社要辦理申請登記。問題是，國民黨可以任意組織民衆服務社和其他黨團活動的次組織，自己申請自己批准，「只許官放火、不許人民點燈」，卻不輕易准許黨外任何含有「難黨」或政治性的組織申請登記。百般無奈之下，黨外只好逕行組織後援會、政會、編聯會之類的社團，希望能藉此團結整合溝通黨外的勢力和意見。最近黨外立委江鵬堅正在籌備成立台灣人權協會，觀察家已認為，因其強烈的黨外色彩，這個人權協會的合法性登記，恐怕也不會被批准。

批不批准是一回事，拿出戒嚴法的殺手鐮，要向這些黨外非政黨性的組織下手又是另一回事。這樣不只是任性地擴展了戒嚴法，作為政治壓制的工具。以台灣三十多年來的政治發展情況來看，這實在是明顯收緊倒退，違反民主政治發展，足以造成政治極端的兩極化。這種一步也不讓地迫人爬上梁山，的政治行為，國民黨決策當局實在應該三思。

對外的政治大退卻

美洲《中國時報》的停刊，各方大致都認為，國民黨內部保守勢力的抬頭和壓抑，使余紀忠感覺到難於承擔和應付，是主要原因之一。奧運會的報導中，因為對中國大陸選手的成績的照實報導，余紀忠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在蔣經國面前慘遭批鬥，被戴上「助匪統戰」、「為匪張目」的紅帽子。在十一月初的美國大選中，該報發表了一篇批評列根的社論，總主筆俞國基被撤換，在中常會上，余紀忠又被保守勢力大肆攻擊，罵他「違反國策」。這些事實，也促成賡錢辦美洲《中時》的余紀忠失去鬥志，選擇停刊一途。

香港九七問題的初步解決和其演變出來的「一國兩制」模式，也使國民黨進退不得、招架不來。一下子大叫「香港前途應由香港居民決定」，但是馬上又發覺有人立刻回應，高叫台灣前途應由一千八百萬的台灣人民決定。一下子大聲「否決」，不接受中英之間的任何談判和協定，但是馬上又發覺不可以「否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收復中國的失土。一下子斷然拒絕任何「一國兩制」的安排，斷然否定它的可行性，但是馬上又發覺非積極支持甚至參與香港不同制度的釐訂、推展和維護不可。一下子認為「漢賊不兩立」，香港國民黨的利益和機構不可能在九七後的香港行政特區繼續存在下去，造成國共和平接觸、共存、甚至是談判的「假象」，但是馬上又覺得香港對台灣太重要了，不能輕言放棄和撤退，而且因實際情勢，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全部接受香港親台的「自由人士」和文教工商機構。結果是，在百般無奈、招架乏力的情勢之下，台灣越來越被迫入意識形態砌成的政治死角裏。由

年中勉強接受「奧會模式」，到年底全面性拒絕和否定「一國兩制」和立委費希平的「大中國邦聯」模式，國民黨能夠提出的理性解說越來越薄弱。

其實，台灣接受「奧會模式」參加洛杉磯奧運，是一個勇敢的創舉。可惜因為在奧運會中，中國大陸表現有聲有色，在華僑社會和世界舞台上引起了很大的震撼，以至台灣覺得相較之下，臉上難看。加上奧運會後，在亞銀、世界刑警組織及其他國際性活動和組織上，「奧會模式」都一再被提出來，作為台灣維持會籍和參加活動必須接受的妥協條件。這個「敵長我消」的迅速發展和「奧會模式」的世界性的普及化，使國民黨內堅持「道統」的保守派無法忍受。儘管台灣很多人相信「奧會模式」是台灣突破困局、重返國際社會的一條狹窄但是可通的途徑，但那些頑固的老人卻極力阻撓，不但根本否定和拒絕了由香港前途問題演繹出來的「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也毫不考慮就一口拒絕了費希平在立法院提出的「大中國邦聯」的政治模式。

費希平的邦聯主張，是台灣和中國大陸各邦有其獨立的內政，獨立的外交，獨立的國防，在各邦之上沒有最高的權力機構，和目前的國共對峙的局勢，除了敵意的消除上不同外，大致雷同。這是一個維持現狀卻又可以導至理性解決雙方爭論和中國統一局面的初步政治安排，而且和鄧小平去年六月間提出的六點統一方案，以及香港問題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物發表的有關台灣統一問題的談話，也基本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國民黨如有意開創新局，突破困境，向中共展開反統戰的政治攻勢的話，他們應該考慮費希平的邦聯建議，不必因那個已經死了三十多年的「法統」的封建面子作祟，嚴斥「大中國邦聯」的言論是大逆不道的

台灣的權力移轉問題

□南 民

●蔣經國雖說未考慮過蔣家成員繼承總統，但家族掌權之說猶未排除，而台灣之好談政權移轉問題，反映了國民心理的虛弱，對政治強人既渴求但又排斥。

八月底，美國《時代週刊》刊登了蔣經國答覆該刊記者訪問的對話錄。蔣經國指出：「中華民國實施民主憲政，自一九四七年行憲以後，總統暨副總統均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國民大會根據『憲法』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來行使權力，將來也會一樣實施。因此，根本沒有總統職位繼承問題。同時，身為總統，我的主要職責是在保護『憲法』並維持民主與法治，至於蔣氏家屬成員繼承總統職位，我從未考慮過。」蔣氏以元首的身份而公開談繼承人問題，這是第一次，而且又宣稱並未考慮過由家屬成員繼承總統職位。這席話自然廣泛被人討論，連帶的，以往只是黨外雜誌在剃刀邊緣談論的政權移轉問題，也開始成了公開的話題。

權力移轉與國民心理虛弱症

最近兩年來，台灣的黨外雜誌及政論雜誌特別熱衷於談論接班問題，尤其喜歡繪聲繪影的談論蔣家第三代的接班可能性。雖然絕大多數這類文章由於資料的不足和識見的不週，因而其參考價值不大，然而誠如富高(M. Foucault)所說：「一本書乃是物質的與概念的多重關係裏產生的事務。」台灣好談這些問題，反映整個台灣社會關係所造成

的結構，而這個結構乃是國民心理的虛弱症。

蔣經國無疑是個政治強人，然而強人終不敵歲月的侵蝕。目前他年歲日增，早年坎坷遭遇以及中年以後的體力智力操勞，在在侵蝕他的健康，糖尿病和白內障已使他體力眼力大傷。一個政治強人的逐漸凋謝，對他的子民而言，產生了曖昧的情感和虛弱的心理：擔憂強人之後台灣不可預期的命運，擔憂新的強人出現，但也擔憂新強人不出現，因而只得無奈的等待蔣經國好好安排一個能孚眾望的新領袖。但反對家天下的觀念早已在人們心中生根，於是藉著討論蔣家第三代的接班可能來宣洩對這種可能性的恐懼及抗拒。也就是說，對接班問題的議論，反映了对政治的焦慮，對家族政治恐懼，對新強人渴望的複雜而虛弱的國民心理。

蔣氏家族掌權之說猶未排除

不過，蔣經國對《時代週刊》上的訪談，雖然談到了一個要緊的問題，但他所談的事實上只是個引言，並未談到問題的關鍵。首先，我們試擬蔣氏四代譜系如下：（見表一）

由蔣氏家屬全體成員的年齡結構而言，「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總統候選人的資格需



▲蔣經國會見《時代週刊》記者，公開談繼承人問題。

為四十歲以上，蔣氏家族的第三代主要成員只能算勉強符合條件。而蔣經國之長子及長女或因病殘，或因從未涉足公家事務，絕無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在這種情況下，家族中只有蔣緯國、章氏兄弟及蔣孝武四人符合最起碼的條件。然而這四人雖參與公家事務，但在現行層級體制中連內閣閣員的層次均未達到，官威清望兩皆不足。目前台灣雖然官僚體系不算健全，但國家元首需要中年以上，在實務政治中至少必須有長期歷練，這種共識殆已為官民各方所共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從未考慮由家屬成員擔任總統職位」，事實上根本就是待答覆即可明白的問題。

在台灣的現實政治中，「職權」與「職位」可併可分，蔣經國任行政院長而嚴家淦任總統時，總

統有「職位」而少「職權」；蔣經國初任總統而孫運璿任行政院長時，總統之「職位」與「職權」則併合為一。嚴家淦任行政院長而蔣經國為副院長時，則事事均由副院長代決，行政院長變成了有「職位」而無「職權」。昔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有「職位」，而「職權」則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選台初期，蔣介石以總裁之身份亦能統轄全體黨政軍工作幹部。由於國民政府的「職位」與「職權」彈性多變，台灣及外國人士關切是否由蔣氏家族成員接班，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出任總統，而在於是否將掌握實際政治權力。蔣經國從「職位」的觀點來答覆「職權」的詢問，亦是避重就輕。也就是說，蔣經國的談話，事實上並未消除長期以來即一直盛傳的蔣孝武與蔣孝勇將會實際掌權的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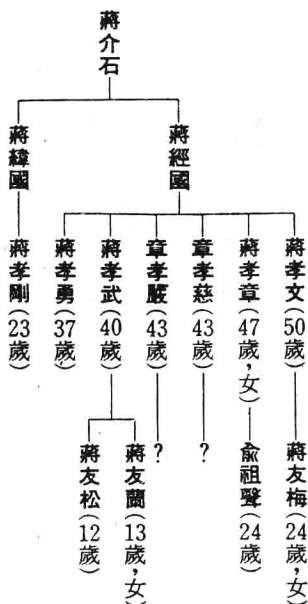
強人饑渴症的存在

多年以來，台灣內外即一直盛傳蔣孝武及蔣孝勇將在蔣經國之後繼承實權。在劉宜良案熱鬧時，由於傳說蔣孝武涉足其中，蔣孝武實際接班之說曾一度沉寂，但不旋踵此說又起。儘管蔣經國本人以及國民黨許多要員曾對此說加以直接間接否認，終

無法使此說稍戢。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就近代政治學裏所謂「強人例行化」(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的理論與實際加以探討。

蔣介石和蔣經國都是政治上的強人。一個強人政治體系，以一人之力而成為社會價值及秩序的中心，以個人而繫國家之安危。強人死後，這種政治體制的權力繼承一向就比其他類型的體制複雜。對於這種體制的權力繼承問題，德國社會思想家韋伯(Max Weber)早已有過透徹的分析。據韋伯的理論，繼承的模式有六種之多，其中能符合現代政治狀況的只有三種：①由老強人指定繼承人並由老強人的徒弟予以承認；②由老強人徒弟之中具有強人特質之幹部推舉繼承人，並予以承認；③藉遺傳方式變為世襲強人制。

不過，韋伯的社會學是一種分類式的「原型社



▲表一：蔣家四代譜系。



▲蔣介石及蔣經國——蔣氏家族的第一、二代。

會學」，在許多地方都缺乏動力學的觀察，在「強人例行化」的概念上即有這種缺點。對此，近代社會學家薛爾斯(Edward Shils)作了很好的補充與發揮。薛爾斯認為所謂的「強人」，它的特質是一種超越的價值與秩序，這種特質不可能在瑣碎的日常工作工作中形成，因為日常瑣碎的工作必須計較得失利弊，必須折衷妥協，這些平凡事務產生不出「聖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強人的徒弟在塑造強人形象時必藉「人比人差一截的感受」(Feeling of inferiority)為訴求方式。由於強人是至高無上的超越價值的綜合體，因此它必然是革命性的，由於強人與聖化同時進行，因此強人繼承成了難決而且幾乎是最大的問題。

由薛爾斯的說明，在理論上我們或許可以了解到為何「強人體制」會被例行化的關鍵。強人體制由於法制不全，「權」「位」的分際含混，在強人的影響下，它的層級官僚系統幾乎無法產生自然領袖。官僚及人民在「人比人差一截的感受」之下長期薰陶，官僚之間不可能發展出尊重禮讓及合作治事的心態，而人民則因而產生「強人饑渴症」(charisma thirst)，對強人的消失感到命運不確定的危機。這樣的政治文化條件，實在為另一個新強人鋪路——或者是依韋伯所列舉的三種方式和平產生新強人，或者就是另外的野心家如軍人以革命的方式自立為新強人。第三世界許多後進國家如此，在經濟發展上和台灣並駕齊驅的新加坡及南韓亦復如此，連民主傳統較深厚的印度亦如此。台灣不能免於新強人的疑忌，事實上並不算突兀。

蔣家對兩位公子的安排

除了在政治社會學上有理論可稽，以及在許多